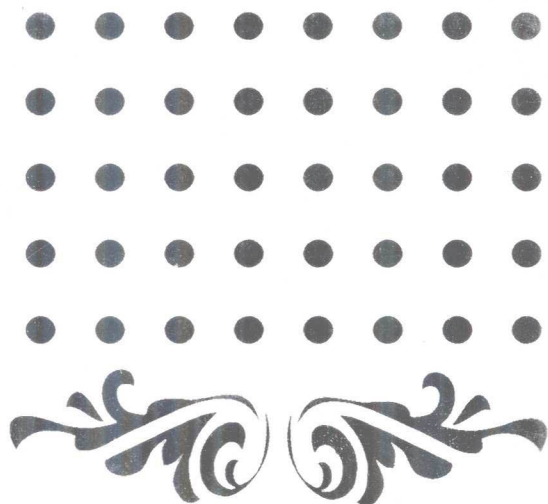


政治学学术经典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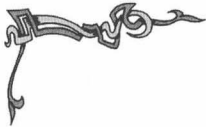
政治生活的 系统分析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美〕戴维·伊斯顿 著
王浦劬 主译



人民出版社



政治学学术经典译丛



政治生活的 系统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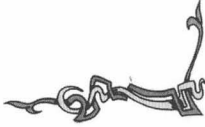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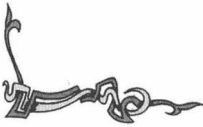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美〕戴维·伊斯顿 著
王浦劬 主译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主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ISBN 978-7-01-011171-1

I. ①政… II. ①伊…②王… III. ①政治学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9757 号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Phoenix Edition

David East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ZHENGZHI SHENGHUO DE XITONG FENXI

[美]戴维·伊斯顿 著 王浦劬 主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1

字数:489 千字

ISBN 978-7-01-011171-1 定价:6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言

这是关于经验取向的政治理论的长期规划中的第三部著作。第一部是《政治系统》(*The Political System*)，它力图在政治科学中提出令人信服的一般理论。第二部是《政治分析的框架》(*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它提出了那些在我看来似乎是这种理论由以发展的主要范畴。现在这部著作的任务，将是提出所运用的那些概念的结构，并以此进一步阐述它们，以使它们能够更加容易地被应用于经验状态。

但是，这部著作仍是一部限于理论层次的著作。其基本目的就是阐释一种概念结构，并且在有可能的地方提出某些理论的命题。其目标不在于从事论断的证实，或明确表明这些概念的应用；验证将紧密围绕理论建构；每一个验证都依赖于另一个验证，并对它产生有效的影响。但是，对于在这门学科的发展中持续不辍的周期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对每一个单独的需要和问题予以特殊关照。鉴于必然发生的工作专业化，我在此书中已决定专注于对经验理论的阐释。有意义的是，尽管得到的关注寥寥无几，但是，它现在正日益成为政治科学中教学、训练和研究的专门领域。

本书补充了《政治分析的框架》中所省略的部分。在这里，我详尽地探究了什么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系统生活过程，探讨了那些借以完成作为一个政治系统的特殊活动的功能。我将继续把政治生活当作是一个被各种不同的环境所包围的系统。由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始终有可能受到来自这些环境的压力。然而，尽管对政治生活有这样一些危险，许多系统仍有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自己的永久持续。我们的问题将难以置信的简单：甚至在经常而不断的危机下，任何类型的系统何能全然得以存在？

在寻求对经验政治理论这个核心问题的答案中，我们势必要探讨这些压力的确切性质，考察那些准确地描述这些压力与政治系统相沟通的途径的概念，相当详尽地探索一个系统为处理这些压力而可能做出反应的各种方法。政治系统有能力把握命运，并造成有利于自己目的的命运，这个唯一的观念将使我们去探索它们这样做的方法。

从最终意义上说，我们不会拥有一种其术语完全成熟的理论。我们将拥有一种概念的结构，由于各种我们将在后面阐释的原因，这种概念结构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在现今的一般理论领域中就可以预料。某些通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但仅仅是副产品。

既然我们将关注于一般理论，我们就必须始终牢记在这个层次上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建设。一种理论的特点，始终将随我们有多大的决心，去密切地细察一个政治系统或随我们离它多远而转移。如果我们离得太远，我们只能见到一个最大的轮廓，而这对有关研究的引导甚微；而如果我们站得太近，我们就将如此详细地看到大量的和混乱的细节，以至于我们的处境几乎不会更好。作为一门科学，我们也许易于对过去缺乏远见，而倾向于过分强烈地窥视我们的主要事务。我在此书中建议向后退，既与我们在过去已经到达的地方相距甚远，又不至于失去所有细节的意义。的确，我们也许不时地希望进行非常紧张的观察，但是我们仅能希望零散地解释一个观点。

那些习惯于政治科学的微观研究特点的人们，将会感到难以省去这么多的东西和难以用如此广阔而急速的眼光扫过经验的地平线。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不能实现我们的主要目的——将这个系统中的关键变量独立出来，鉴别其中某些最有意义的关系，并提供一种关于理论方法的连贯思想。

理论建设有点像良好的摄影技术。如果我们起初拍摄了广角镜头，以便于我们能看到各个部分，那么，各种细节就会更加清楚，并且使得近距离特摄的各个片段更符合于一个范围更大且更连贯的构图。这就是在此从事的这种宏观分析的唯一任务。

在《政治分析的框架》一书的序言中，我已指明蒙受了他人在许多年当中的恩惠，在这些年间，现在的这些思想就已开始创立了，我将这个读本归功于那些评论。它们在此将得到同样公正而有力的应用。

但是我再次希望表达我对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分院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所提供的财政资助的感谢，也感谢福特政府事务研究教授职位（1960—1961 年）所提供的由我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和基金。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高级行为研究中心任职员的一年（1957—1958 年），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特别系统化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我思考了许多在本书中所论述的问题。前一年在芝加哥，迈耶（Vicky I. Meyer）和巴茨洛夫（Ruth Butzloff）在注释和加工整理原稿、誊印手稿和谨小慎微地组织脚注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还应特别感谢史密斯（Rosemary Smith）夫人在校读冗长的手稿和依次有条不紊地进行出版的最后阶段准备方面的细致技术。

我将此书题献给我的夫人，仅以此象征性的形式，表示对她积极参与我每一阶段的学术、编辑和行政工作的感谢。

戴维·伊斯顿

1964 年 12 月

菲尼克斯 (Phoenix) 版序言

《政治分析的框架》和《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平装本的出版, 表明了 in 政治科学及其他科学中对基本理论的不
断关注。它证明, 即使对政治学这门学科的基本知识的兴趣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就已倾向于支持应用性的知识, 但这种兴趣现在仍未消失。

纵使不运用规范的和期望的解释, 也不难说明这个脱离基础研究的运动。
社会科学家常常观察到, 这种研究像钟摆一样摇摆于材料收集和理论建构之
间。不管这种观察对政治研究可能有多大益处, 它仍是不适当地去描述或说明
了 70 年代期间政治科学所发生的一切。在平衡经验工作和理论建设方面, 这
门学科今天所经历的困难比过去更少一些。更确切地说, 对基础研究兴趣的衰
退, 就是一种性质不同的转变的功能, 这种转变已使得一系列实质性的兴趣
(政治分析) 取代了另外的兴趣 (基础研究), 其结果便是事实之轴与理论之
轴相脱离。

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间, 即使有任何支配政治科学前途的远大抱负, 那也
都旨在使行为主义运动及其分支将能对基本上理解政治系统怎样运转有所贡
献。确实, 传统政治科学的批评者们典型地抱怨以往那些在这种知识尚未成为
众所周知的常识之前就过早地应用它的趋势。研究中更加严格的目标之一, 就
是增加理解的可靠性, 它常常与定量化相联系。唯有当这些可靠性有所改进
时, 政治科学家才有权为处理社会问题的决策者提出忠告。

作为一种信仰, 我们能或不能在实践中抵制提出劝告的诱惑是另一回事。
但是, 再三表示对研究基本知识的渴求和意图, 至少为这门学科增添了新声。
我们那时的目标就是现今科学的传统目标, 即作为应用知识可以最终基于其基

础之上的基本知识。鼓励和报答势必导致那些研究看来有向这个理想发展的前途。

在这个献身于基础知识的时期，选择研究领域的标准，据认为是根据基本知识的需要而建立的。然而，到了70年代，由于那些在60年代的剧烈变化期间已变得极其明显的原因，与其他社会科学齐步，政治科学的实质性核心已发生了急剧的变迁。目前开始认为是重要的研究，更可能取决于它对解决或修正某些紧迫的政策问题——污染、能源短缺、资源保护、都市衰落、没有恢复对犯人的监禁、卫生服务，诸如此类等等——所能直接作出贡献的程度。

从基本问题继续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程度上讲，它们可能围绕两个系列的问题旋转：我们怎样才能改进我们对政策输出的决定因素和结果的理解？我们怎样才能解释与目前流行的政策关注相反的，我们早先对基础性内容的专注？这后一个问题直接将这门学科的理论性引向那些决不与肤浅性相称的认识论问题。然而从最终结果看，政治研究从70年代就开始显示出对此时此境的极大关注，它大量地预料着未来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和在这个急速变化着的世界上，我们应该从正在从事的那些看起来好像能立即处理的问题中获得满足，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我们由于缺乏对正在起作用的基本力量的理解，而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一旦幻想破灭，我们便会在日后失望。因为非常可能，我们那时所被迫面临的政治问题甚至将会被我们所处理的政治问题更加难以对付。我们现在正从事政策事务这一事实，并未证明我们知道怎样处理它们，甚或怎样减少它们的紧迫性。我们已经碰到的那些反对变革和无视政策效果的范例，可能将会产生出新的和更高程度的失败。由于我们可能失败而可能引起的幻灭的政治后果，在以后几年中将导致比60年代更加苦恼的新的政治混乱。这将奠定那时我们将被迫面临的更加紧迫的新问题的基础。

显然，如果我们对未来少打几分严重的折扣，未来就可能显得更少令人失望。如果我们在必然注意政策事务的同时继续追求基础知识，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至少将在将来当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某个时候，发现自己有机会能够提供比现在所能提供的更可靠的劝导。

如果我可以擅自对此加以评论的话，现在这两本平装本——它们显然旨在

论述基础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事务——中所作出的决定将指明我们仍然将严肃地专注于对政治系统如何运转的长远思索。这门学科事实上没有完全对未来持怀疑态度。尽管核战争引起的毁灭性破坏的危险一直笼罩着，但仍然多少可以意识到，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也许并不会都灭亡，甚至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是这样，虽然凯恩斯的警言正好相反。我把对一般性理论的兴趣看成是献身于将来的一种表现。

然而，我在这一点上的观点势必将比科学史所要求或允许的更严格地区分理论与实践。理论并不始终像它可能表现的那样远离日常的实践。即使理论取决于基础知识，具体的事情也将常在这条通往长远目标的道路上发生。自然科学中常常有这样的评论，被当作是一门科学之逻辑发展的纯粹功能，而不是来自某些紧迫性的社会需要之压力的一些发现，常常会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它们对直接的和紧迫的实践事务有无可怀疑的应用性。在系统分析的情况下也同样，那些被当作是基础性的东西，反过来又意味着直接的目的。其中有两个实例值得提及。尽管它们缺乏在自然科学中的巨大影响，但这些不时被批评为明显脱离日常政治生活的理论却表现了一种理论的政策相关。它们也显示了出乎意料的理论建设的社会效果。

在系统分析发展中，在我看来，如果非系统地处理，政治科学所拥有的一个关键变项就将前后一贯地是支持的输入。由于某些我在书中已解释的理由，在所有政治系统中，将这种支持当作是对准以下三个基本对象的设想是有用的：当局、典则和政治体。对这些对象的支持水平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系统运转的许多关键性方面。

系统分析这部分是先验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它独立于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在社会价值和实践中激烈而急速的变化。那个时期，在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引起了一大堆这样的事实，它们似乎寻求一种能够为其提供秩序和意义的理论。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学生一辈的骚动，各种自我意识的种族团体的出现，反抗种族主义和性主义的聚合；在美国，当代的黑人运动，越南问题，水门事件；在法国，学生反叛——所有这些及类似的事件，都有助于在众多的工业化社会中蚕食对统治当局的信任和信心。有关当代政治系统的统治能力问题便产生了。那种认为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存在着一种危机的思

想，甚至一度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一块小小的基石。

这个时期起作用的东西准确地说就是系统分析在理论的水平上已力图逼近对政治科学的关注。60年代和70年代中，因时因地而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种对所有政治对象的支持输入（即信任和合法性的支持）的明显减低。

那个时期的事件似乎已经赶上了理论。一大堆概念已在舞台的侧面等待着应用于理解这些全然出乎意料的偶然事件，也等待着将它们纳入一种前后一致的联系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于每一个对象的支持减少的确切性质和程度，对于某一对象支持的减少而对其他对象所引起的影响，失去支持的原因，理所当然还有关于整个政治经济领域的概念化系统的特殊后果和正当性。马勒（E. N. Muller），丹尼斯（J. Dennis），米勒（A. Miller），西特林（J. Citrin），菲尼夫特（A. Finifter），塔嫩豪斯（J. Tannenhaus），博因顿（G. R. Boynton），沃尔克（J. Wahlke），奥卡马拉（T. Okamura）和门罗（K. Monroe）的著作就是大量早期向这一方向迈进的著作中的一部分。确实，如果不把在这十年间所发生的两个作为历史性分水岭的事件纳入至少是类似概念化的支持之类的术语中，就难以追究它们的根源和解释其实际的和潜在的后果。紧随着这个时期，有关支持、信任、合法性和异化的大量文献，证明了系统分析的这个部分意外地适合于社会事务。

与此相似，系统分析期望并且已经能够提供一种基本的理论，处理与这几十年间发生的事件有关的另一些政治问题。在60年代，民主制度下的人们终于认识到代议制是不够的。即使选举的习惯做法得到改善和立法者愿意更勤于倾听选民的呼声，甚至即使使政府的政策能更加反映民众的要求，事实上许多政府政策似乎并未到达所欲的结果。在美国，约翰逊当局的扶贫规划（The Poverty Program of Johnson Administration）就是对此的一个例证。即使在越战从这项规划中夺取财力前，不仅显得难以实现规划的目的，而且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加重贫困或使现存条件下的贫困稳定化。社会科学家终于认识到，仅有那些良好的动机，甚至实施这些动机的实际决策和巨大的财源、人力也许是不够的。即使说服权威当局相信其价值，在实现目标方面，莫名其妙的成功也似乎会使学者们困惑不解。至少也必须更加谨慎地估价意图和结果之间的一致。

这种新认识的结果现在也成了历史。70年代，在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问

题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许在政策分析运动中得到了最好的概括。这个运动已经有吞食所有研究的危险。它将注意力引向政府的活动及其后果，即在系统条件下的各种输出和结果。政治科学在过去由于偶然的兴趣而指出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了研究的中心。我们力图解释和理解当局做些什么，从其自身目的看，怎样做才令人满意，会发生何种意外的副作用，政府行动的效果怎样反馈给下一个政治行动，等等。所有这些关注与那些社会认为紧迫的问题有着特殊联系。

在这里正像支持的情况一样，我们再一次拥有一大堆原始的事实和事件——突然觉察到在民众的愿望、要求与政府行动的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好像在四处寻找一种整理它们自己的方法。即使由于对 60 年代和 70 年代不满情绪的预见使系统思想没有发展的话，这种分析模式的理论必然性，也已迫使人们详细地从概念上注意那种由于新近对政府行动的关注而提出的事情。与先前那些几乎是通俗的和无可怀疑的分析模式不同，这种系统方法已坚持认为，应把政治系统当作是一种政治关系的运动序列。正像有关一个政治系统的全部性质的这个公式可能会显得简单明晰一样，如果曾一直把政治生活当作一个系统，那么政治科学早就很少有要做的事和几乎不用生产出典型性的产品了。一个政治系统就是将支持和需要的特殊结合转变成系统思想所说的输出（政策）的工具。而当当局和公共机关为增大达到所选目标的可能性而修正过去的行动时，输出反过来又有了已被当作是结果（第二位、第三位的后果）的东西，它们可能反馈到下一轮输出。

简而言之，政策分析是系统思想无可怀疑的核心部分。因而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许多对政策分析感兴趣的人已经能够在我的著作中发现一种现成概念，它有助于鉴别和探索在政策输出研究中可能面临的核心问题。它还附加地提供了有助于将这个研究领域置于有理论意义的政治系统研究联系之中的便利。

无疑，一个完满的政治概念将要求目前对政策分析的过分专注在要求引起注意的理论问题的性质方面服从一个更均衡的观点。当这种平衡发生时，我们就将有机会作为一门学科去考察输出和结果——政策及其复杂的后果——在另一个同等重要的，与已指出的系统分析一样的政治生活方面。然而，当我们关注在当代占有突出地位的输出的同时，遮盖其他的事务，这并不必然是不适当

的，至少在我们彻底了解其意义之前。所有科学的历史都指明，知识是以这样凌乱的方式发展的，有时它反映时代的需要，而有时反映理论和逻辑的内在需要。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提及的这两个当代感兴趣的领域——支持的输入和政策的输出——仅仅为的是表明在基础或纯粹的政治科学研究与知识的应用之间的鸿沟并没有像我们可能认为的那样宽广。尽管对基础研究的证明是独立于直接应用的，但系统研究已经拥有如此直接的应用性这一事实就已经无损于基础研究的目标了。因此这两本书的平装本的出版有助于再次证明，对这门学科的理论发展的长期关注，根本无须削弱把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所有知识服务于社会的直接需要的能力。

戴维·伊斯顿

1979 年

中译本序言

能够就《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以中文出版事宜略作述介，令我不胜荣幸。这些年来，我几度有幸向中国学界同仁谈及本书的内容，这说明中国学人对我所述及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兴趣，亦表明了他们思想的大度开放。对于中国学者在政治探索过程中就系统思想的内涵作进一步切磋来说，这都是些祥瑞之兆。

自本书首次面世以来，荏苒二十载光阴已逝。这二十年来，恍若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政治科学历经沧桑，遭际了若许意味深长的沉浮变化。要想明了系统分析在政治科学中的当前地位，自应体味斟酌这些变化。近几年来，本书屡屡被译成各种文字，这就使我有机会就这本书问世以来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变化，来掂量衡度系统分析在政治科学中的当前地位。我想，经常以同一种语言，使我的中国新读者们知晓我在其他著述中所作的种种思考，那委实是再合宜不过了，可是碍于语言的樊篱，这一想法恐难轻易实现。

在本书首次出版时，整个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中的主要趋势是致力于基础性研究。以往的研究遭到了抨击，因为它们缺乏科学的精确性，过分执著于研究即时的社会问题而舍弃了基础理论，不能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种种陈述之间作出缜密甄别，忽略了理论作为省悟之主要工具的意义（见拙作《政治系统》1953年版）。这并不是说，当时的所有学者都对以往的研究持有非议，不过，这些责难确实代表了政治科学的主流，它们已经促进了政治科学的移易革新。就其探求政治系统的基本理论来说，《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的出版既证明了新的政治科学的存在，又促进了其继续发展。

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的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60年代

末和 70 年代的所谓反文化的革命 (Counter-Cultural Revolution) ——当然, 不能将它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在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及希冀、追求方面引起了诸多变迁, 其时, 人们接受这些变迁的速度有如这些变迁自身的实质一样, 都是始料未及的。今天, 我们对这些变迁业已全然知晓, 因而我无须再赘述其特点。在西方, 我们依然处于其影响之下。

这些变迁因其特定的内容而有所不同, 亦因不同的地区国度而迥然有异, 可是, 它们却以某种形式对整个学术界内外产生了影响。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 这些领域包括: 种族和性别的歧视, 环境的污染, 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 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 核军备的重整, 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鉴于世界共同体中对这些问题存在新的、仍在增长的迫切感, 社会科学再度发现, 亟须对这些领域予以严重而系统的关注。与其说是科学的逻辑, 还不如说是种种社会问题为社会科学确定了前提。

其结果, 应用性社会科学迅速开始代替早先揭示基础知识的努力。人们心中滋生了一种情绪, 这种情绪兴许仅只可以察觉, 然而它却令人信服地表明: 由于人类面临着核大战引发的甚或是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生态灾难造成的全体毁灭的明显威胁, 由于地球自身的存在确乎濒临绝境, 因此, 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要比我们过去的设想来得仓促突然。在社会科学中, 甚为迫切之事似乎是运用我们累积的悟性和灵慧来解释当前的问题, 而不是钻研基础知识。人们对于我们当前社会知识的可靠性极为有限这一点忧戚重重, 这些忧戚必然既使寻求答案的限定时间愈加紧迫, 又使与此相关的公民们对于答案的企求益发热切。

我们自然会想到, 这些潜在的、通常并未公开表露的情绪, 促成了政治科学中诸如政策分析这种新的支配趋势。50 年代, 政治学家中公认的普遍习惯是提供有关社会变化和革新的专门咨询, 当时的批评家们对此很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 我们的知识极为有限, 并不能验证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否可靠适宜。而 80 年代,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极大变化。政治学家公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一道, 认为如果现下社会迫切需要并期冀自己提供某些帮助, 那么, 即便这些帮助更多的是以所企望的可靠性为基础, 而不是以知识的可靠性为前提的, 提供这些帮助大概也要比全然无动于衷要强些。

自从本书第一次付梓以来，政治科学中还发生了另一些重要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50 年代末，经济近乎一无阻滞地节节增长，而到 50 年代末，随着这种战后繁荣的消逝，经济开始成为人所关注的中心领域。美国 1958 年开始的一系列经济萧条给表面持久繁荣的岁月投下了阴影。人们不禁回想起了 30 年代大萧条的境况。基于其对于社会变化的感受，社会科学各学科迅捷开始反映这种再度兴起的对于经济的兴趣。

在政治科学中，这一点也以若干方式得到了体现。首先，在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此时，人们再度承认了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的影响。

其次，再度兴起的对于经济的研究兴趣一定程度上是由政治科学引起的，为此，政治科学中的一个旧式术语“国家”（state）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在 50 年代，随着行为主义的变革，作为一个概念的“国家”被认为不合乎要求，不久就为一个含义更加丰富的术语“政治系统”所代替了。“国家”这一概念之所以会被政治学首先摒弃，是因为它早先是含糊不清的。虽然现今照我看来，它丝毫不明晰可鉴，但它却又成了分析的术语。其原因，我在《国家重围之下的政治系统》（“The Political System Besieged by the State”）^①一文中已作了剖析。除此之外，这一概念复苏的原因，一定程度上还确实在于我所说的美国社会科学受到的第三次马克思主义的冲击。第一次冲击自然是在马克思在世期间，第二次冲击则是在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那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渗入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今天，在其第三次冲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尼科斯·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著作中所阐述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前社会科学的方向和某些理论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新生的马克思主义使“国家”这一概念得到了复苏。现在，人们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国家”作为分析的核心定向范畴予以采纳和适应，甚至那些对于同马克思主义相近的一切思想都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亦复如此。这一术语与迄今仍

① 《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1981 年第 9 期，第 303—325 页。

然普遍使用的“政治系统”概念比肩而立，两者之间的关系尴尬局促，而且常常得不到说明。

第三，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一方法是从经济学中移植来的。首先设想由假定的理性行动者作出种种选择，再根据这种设想，建立政治行为的若干模式。经济学的这种技术性创造，起初为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了诸如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论述正义问题的著作的初始推动下，这种方法使政治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与历史的和分析的研究相分离，使政治哲学家像以往那样关切研究正义和更高的道德性等实质性问题。理性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已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

当然，对于政治研究来说，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什么新鲜事物。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9世纪就曾对此作过大量论述，前面我也已提及，30年代它在美国曾风靡一时。此外，即使行为主义在其他地方盛行时，它在欧洲也从未真正寂灭过。不过，这时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凡响之处，并不在于它要重新努力揭示国内外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照早先的政治经济学看来，这一点是这种学说研究的核心，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所有的美国人（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人）都不认为这一点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移易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含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也确实因为如此，许多经济学家才主张实行这种“大帝国主义”。

热衷于这一模式的历史性初次狂潮现在正开始消退。经由政治研究的各个领域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此模式的多次试验，人们正在作出早可料及的批评性反应。尽管如此，在80年代中期，理性模式一开始所具有的某些魅力尚

不会消耗殆尽。

论及《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首次问世以来政治科学研究方向和方法上的所有这些变化，我又回到了开始这番议论之初所提出的问题上：随着本书被译成中文，今天，系统分析的位置何在呢？

首先，系统分析现在仍然是研究一般理论的唯一通览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竞争对手。我之所以谓之“不幸”，是因为众所周知，只有某种理论方法不断为其他理论方法所替代，科学才能够获得进步。以理性的假设为基础的模式并不是系统分析的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并没有声称将适用于政治研究的一切重要领域。

一方面，因为这些模式具有简化主义的特性，所以它们恐难适用于政治研究的一切重要领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些模式用作分析单独的行为或分析被看作一个个独立单位的集体行动者，是适宜的。而且事实证明，当这些单独行为处于竞争状况而不是合作状况时，这些模式更加有用。它们既不能被成功地运用于政治研究各重要的规定领域，亦不能圆满地研究那些可能限制、而且有时甚至支配单独行为的结构性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理性建模的范围必然要受其简化主义特性的限制。总之，如同我所指出的那样，不能想象，简化主义的理性建模是向一般政治理论迈出的一步。在广袤丰富的政治研究中，存在着许多必然的领域，即使按照这种模式最乐观的倡导者的看法，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显然也是这种模式所力难胜任的。

另一方面，系统分析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系统分析构成了其贯通整个复杂结构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若干机构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政治系统”。总之，系统分析现在仍不失为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

其次，虽然政治科学的大部分阵地已为政策研究所占领，整个研究和教育系统中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而创造知识，可是，我一向认为，对于一些坚持追求基本悟性的人们来说，仍然存在着施展余地。在西方，我们现在仍然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即自 50 年代迄今的前几代人所积累的重要知识，还在为我们所运用。虽然在过去的岁月中，政治学科的大多数研究